

亦或一道也。”^① 这见解比较简略，且对策思路无甚新意。

第四节 徐润、经元善的经济思想

一、徐润的经济思想 徐润(1838—1911)，原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52年随其叔父到上海，先进上海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习丝茶业务，后任帮理帐务、主帐、副买办。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后在上海开办绍祥、宝源、立顺兴、川汉等货号和宝源祥茶栈。1873年被李鸿章委任为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商董。1884年离局。1903年重任会办、代理总办。1907年被袁世凯解除职务。从1864年投资钱庄、布庄时起，徐润在各地创办或参与投资的企业有仁和水险公司、济和水火险公司、安徽贵池煤矿、广益房产公司、天一垦务公司等。至于其在上海的民族资本企业则有同文书局(与其从弟徐宏甫合办)、上海景纶衫袜厂等。

徐润是一个从买办和官僚企业经营者转变而成的民族企业家。他著有《徐愚斋自叙年谱》(附《上海杂记》内外篇)，其中详细记录了他到上海后60余年的经历，也是研究上海近代经济史的珍贵资料。徐润的企业管管理主张一部分体现在他和唐廷枢共同制定的招商局局规中，而比较直接反映其经济思想的则是一篇题为《拟兴滦州卞凉汀商务公司节略》的文章。

和当时许多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一样，徐润将欧美国家的强盛归因于商务的发达，他指出：“西洋各国，俱以通商致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国本固。”^② 据此他强调：“振兴商务”，“所宜

① 《兴利》，《弢园文录外编》，卷二，第45页。

② 《徐愚斋自叙年谱》，第89页。

急为讲求,庶几在地之利可以渐兴,在我之利不使外溢”^①。这就揭示了他所说的发展商务的双重目的:一是促进民族经济繁荣,二是利权不致外操代庖。

怎样才能兴地利?徐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通过对热河后府围场蒙古暨承德、永平两府所属 14 个州县的经济考察,认为当地的丰富物产资源大有开发价值。这些物产主要有土丝、棉花、高粱酒、白面、皮毛、桑皮纸、烟叶、花生、香木粉等。同时,他又指出开发商务必须具备一定的环境条件,包括交通是否便利,劳动力是否充裕,生活费用是否低廉,原材料价格是否合理,销售市场是否有潜力。经过具体分析,徐润认为该地区是符合经济开发诸项要求的,于是他断言:“由此以观,地势形便,工料减省,消(销)路广达,其利不可胜言!”^② 这一番见解虽然不是针对上海而言,但其中所表现的近代意识和考察思路则标志着上海民族企业家的经济思想所达到的新水平。

对于创办滦州卞凉汀商务公司的意义,徐润从振兴内地经济的角度作了简略的论证,其中涉及到交通、税收、贫民生计等内容。徐润指出:拟议中的商务公司“如能得利,逐渐扩充,内地之商务由此兴;外洋之利权由此分;货由铁路运载,养路之费亦可增添;厘金关税亦可以增加;销路一广,出产益多,且可借工作以糊口,于贫民生计亦为有益;是一举而数善备焉”^③。中国近代出口商品均为农产原料,徐润所说兴办商务可分外洋之利,当指发展中国自己的加工工业,表明他说的商务是包括工业在内的广义概念。至于将发展商务同解决贫民生计问题联系起来,则是

① 《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90 页。

② 《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91 页。

③ 《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91—92 页。

与当时的改良派经济思潮相一致的。

徐润在企业经营形式问题上主张实行“招集公司”^①的办法。中国近代的工商业公司有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完全商办等类型,徐润没有明确指出哪一种类型可取,但他整篇文章没有提及官股,也未要求实施官督,如果联系到他在19世纪末期已感受到官办企业的弊端,并开始转向民族资本经营,可以推断他当时倾向于商办。

二、经元善的经济思想 经元善(1840—?),号莲珊,浙江上虞人。他在年轻时就“习计然术”^②,承父业经营钱庄。19世纪70年代后期,他倡议绅商义赈,救济北方四省旱灾,获得社会舆论赞许。1880年受李鸿章委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商董会办,1882年出任上海电报局总办。后合办织布局,因中途发生纠纷作罢。此后又曾应张之洞之邀商讨筹办湖北纱厂事宜。1900年,他与人联名通电请求撤销废帝立储之命,被西太后下令通缉,逃至澳门,后遭监禁。出狱后著书《居易初集》,凡3卷。卒于上海。他的经济思想除赈济论外,重点是发展商务论。

经元善主张通过节省开支费用的途径帮助灾区渡荒。针对有人认为捐资救灾是杯水车薪的疑虑,他算了一笔帐,指出:“中国舆图二十余省,今既以十八省计算,各处偏灾折作两省,尚有未荒者十二省,每省扯六十州县,每县扯人十万,每人每日省钱一文,每日可得钱七万二千文,通年可省钱二千五百九十二万千文。国家之发帑不计也,殷富之输将不计也,邻国之移粟不计也,果能滴滴归公,有何不可救?”^③他还要求各地节省糜费,“如神

① 《徐愚斋自叙年谱》,第91页。

② 《自序》,《居易初集》卷1,第1页。

③ 《急劝四省赈捐启》,《居易初集》卷1,第1页。

赛会演戏烧香寄库之资,核计消耗物力十之一二,均可停省一年,移作赈济。”^①对于民间义赈的实施,他倾向于“民捐民办”^②的办法。

如何振兴民族经济是经元善始终关注的问题。他和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一样,明确主张仿效西法,由国家保护商务,并切实杜绝漏卮。他指出:“今中国海禁大开,外人商舶麇集,载货而来,易银以去,漏卮之巨,每岁何止亿万,即洋布一项,已有三千余万之多。尚再安常蹈故,必致日渐困穷。”他批评当权集团不重视扶植商务,“官不为之经理,习而久焉,官商两途判若天渊,以致情意隔阂而不相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泰西各国,官商一气,不惮越国鄙远,国家又复悉力保护,是以所向有功,无往不利。”据此,经元善要求中国政府“亟宜仿效西法”,制定有利于民族经济走上正轨的政策措施,增强国力,“收回利权”^③。

值得注意的是,经元善所说的仿效西法并非指全盘照搬外国模式,而是要求对传统经济政策思路进行改革。他强调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既要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又要结合中国实际,即所谓“参酌中西,因地制宜”。他告诫说:“若一概仿效西法,如强俄以成合众,强美以专君权,必难同轨合辙”,“中国商务呆仿西法,欲望开辟利源,收回利权,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戛戛乎难之。”^④这见解在当时是难得的深刻之论。

在企业经营形式方面,经元善的观点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在19世纪80年代就断言商办形式有利于企业发展,认为:“泰西各国,兴办各项公司,无不招集股本,群策群力,积微成

① 《急劝四省赈捐启》,《居易初集》卷1,第2页。

② 《送两弟远行临别赠言》,《居易初集》卷1,第8页。

③ 本段引文均见《上楚督张制府创办纺织局条陈》,《居易初集》卷1,第24页。

④ 本段引文均见《中国创兴纺织原始记》,《居易初集》卷2,第40—41页。

巨,故能长袖善舞,所向有功”,而在国内,“轮、电、开平,得以通情而持久者,亦赖有商股也”^①。但是当时他对官办或官督并无反感,只是强调“官商相维,而商为尤重”^②,并主张在一定条件下逐渐转为商民,若“永为官局,必致日久弊生”^③。

随着封建官僚集团对民族经济干预的加剧,经元善对官督商办的弊端所持的不满日益加深,成为一个激烈抨击官办或官督商办经营形式的人。这些抨击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在用人制度和办事作风上,官僚创办者或者“在官阶班次中求才”,“且官气之浓甚于沪,最是商情所大忌”^④。或者“用人行政不推归商董公议,而欲权自独操”,所委者有的因“难辞情面”,有的为“戚故安置”,这些人根本无心经营企业,“无非存五日京兆暂时避雨之计”^⑤。在处理与外商的关系上,“但能压抑华商,不能止遏外人,西人决无此措施,自鋤同类,背道而驰。”^⑥基于此,经元善将官办或官督之类的经营弊端视为导致中国商务不振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尖锐批评说:“官真能保商诚善,无如今之官督,实侵占商业而为官办,吴门某君曾讥之曰:‘挟官以凌商,挟商以朦官’,真情如此。”^⑦他进一步揭露了官督的实质是私家聚敛财富,认为这批官僚“病在深中‘为我’二字之毒”^⑧。他强调:“欲开利源,扼要首在立民信义,非沾沾为专图一家一人之私利”,因此必须革除官督的流弊,否则,“朝廷设立商部,仍循此轨辙为宗

① 《上楚督张制府创办纺织局条陈》,《居易初集》卷1,第31页。

② 《上楚督张制府创办纺织局条陈》,《居易初集》卷1,第32页。

③ 《上楚督张制府创办纺织局条陈》,《居易初集》卷1,第31页。

④ 《中国创兴纺织原始记》,《居易初集》卷2,第39页。

⑤ 转引自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页。

⑥ 《中国创兴纺织原始记》,《居易初集》卷2,第42页。

⑦ 《中国创兴纺织原始记》,《居易初集》卷2,第40页。

⑧ 《中国创兴纺织原始记》,《居易初集》卷2,第42页。

旨,再过花甲一周,依然是贫弱中国。因往以推来,虽百世可知也。”^① 这种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封建制度本身的痼疾,显示了经济思想的深刻性。

如前所述,经元善主张由国家制定和实施保护商务政策,其中税收调节是重要环节。对此,他呼吁对民族工商业实行“轻税厘”^② 和“免税厘”^③ 的优惠措施。针对当时江苏徐州一带滥征税款的情况,他进行了揭露和抨击,指出“天下关卡之税莫苛于淮徐”^④。由于“沿途闸官更有需求,每船货物,综计其关税厘金,胥役饭食,闸役饭食,闸员私营等项,较本价且逾数倍。宜运河之商贩裹足,致土货不能出,外货不能入,而民生日困也。”^⑤ 他认为一旦实施轻税和免税政策,不仅使民族企业首先受益,而且将有力促进商品流通,并有助于国家主权的维护。

在谈到企业经营管理问题时,经元善发表了自己的一套见解,其观点涉及到交通、信息、金融、人事、供销、劳工等方面。在提出企业采买原料所应遵循的原则时,经元善表述了他的价格论,他认为:“大凡物价,买者多而卖者少则贵,买者少而卖者多则贱。”^⑥ 他没有认识到这种市场供求状况导致的价格变动是以商品价值为中心展开的。从这种定律出发,经元善要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留心访察各处年成丰歉。如上年底价高昂,年出产较旺,则宜少买,只须存一月之用,以待市价之疲,陆续采买。尚上年底价低平,本年出产不丰,宜乎尽力广收,多备数月半载存

① 《中国创兴纺织原始记》,《居易初集》卷2,第42页。

② 《上楚督张制府创办纺织局条陈》,《居易初集》卷1,第30页。

③ 《上盛杏孙观察利国矿条陈》,《居易初集》卷1,第21页。

④ 《上盛杏孙观察利国矿条陈》,《居易初集》卷1,第21页。

⑤ 《上盛杏孙观察利国矿条陈》,《居易初集》卷1,第21页。

⑥ 《上楚督张制府创办纺织局条陈》,《居易初集》卷1,第28页。

货,宜随时斟酌。”^①

经元善对企业中的人事管理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认为企业管理者应该“恂恂无华,通计然术”^②,对这种精于经营的人才不妨实行“厚禄糈”^③的政策,因为在他看来,“创非常之大业,欲责任事之人专精一致,必使之无内顾之忧,否则必另营他业,分心外驰,何能收效。”^④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他重视对工人的技能培训,而在劳动时间的管理上,他强调每周工作6天的必要性,因为,“人无贫富,总有家庭私事,七日一歇,则此六日中,可以专心致志。若无此一日之停,则终岁皆存偷闲之念也。”^⑤

为了便于企业内资金的流通,经元善提出由企业自办金融机构的设想,他建议“酌提股本万金,……自开一庄,自印极精钱帖,以代钞票之用。既免意外之虞,又省运钱之劳,……似亦收回利权之一法也。”^⑥这对国家币制的统一有着不利的影响,但在当时提出,则又有一定的合理性。他认识到修建铁路对企业发展有长远的利益所在,不仅如此,“官商行旅,无不目睹其利便,大足开内地风气之先。”^⑦关于信息技术的更新,经元善指出:“凡外洋矿务商务,首重信息灵通转运便捷,故能操纵自如独擅其利”,而在中国企业,“函牍请示,动辄经旬累月”,以至对市场状况了解甚慢,因此他希望尽快在企业联系中采用“通电报”的形式,以使“数十里外信息,可朝发夕至矣”^⑧。这些议论虽然比较

① 《上楚督张制府创办纺织局条陈》,《居易初集》卷1,第28页。

② 《上楚督张制府创办纺织局条陈》,《居易初集》卷1,第24页。

③ 《上楚督张制府创办纺织局条陈》,《居易初集》卷1,第25页。

④ 《上楚督张制府创办纺织局条陈》,《居易初集》卷1,第25页。

⑤ 《上楚督张制府创办纺织局条陈》,《居易初集》卷1,第30页。

⑥ 《上盛杏孙观察利国矿条陈》,《居易初集》卷1,第22—23页。

⑦ 《上盛杏孙观察利国矿条陈》,《居易初集》卷1,第18页。

⑧ 《上盛杏孙观察利国矿条陈》,《居易初集》卷1,第21页。

零星简略,但却透露了上海民族企业家期望实行现代化企业经营管理的最初信息。

第五节 钟天纬的经济思想

钟天纬(1840—1900),字鹤笙,华亭亭林(亭林今属上海金山)人。1872年在上海广方言馆肄业,为该校优等生。1875年起任职于山东机器局。1879年应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之邀游历考察欧洲各国。两年后因病回国。1882年进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88年到山东烟台,被盛宣怀委为矿学堂监督。次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招往湖北,任自强学堂监督等职。甲午战争前夕曾到天津随李鸿章校阅海军。1895年重入翻译馆任职,并担任机器厂委员、吴淞电报局长等。1898年,被刘坤一、张之洞、陈宝箴等推举应经济特科,因戊戌政变而作罢。晚年在上海倡设学堂,编著教材。著有《刖足集》、《格致课存》、《随轺载笔》、《救时百策》、《佐幕刍言》、《时事刍议》、《扣虱录》等,另有译作多部,如与英国人罗亨利(H·B·Loch)合译的《西国近事类编》,与傅兰雅(J·Fryer)合译的《工程致富》、《英美水师表》、《铸钱说略》、《船坞论略》、《行船章程》、《考工纪要》等。因“屡经兵燹,原稿泰半散佚”,特别是1932年初,“沪战突起,商务书馆被毁,承印之稿亦付诸一炬”^①。现存《刖足集》(内、外篇共二册),是研究钟天纬经济思想的主要资料。

从基本思想倾向来看,钟天纬属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他同王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麦孟华、汪康年等人结交。戊戌变法时,曾劝康有为等“宜缓不宜骤,宜因不宜创”,否则“必遭多

① 钟境英:《刖足集外篇·跋》。